

# Investigation on Cultural Quality and Employment Trend of Ecological Immigrants in Hongsibao District of Ningxia, China

Jiayu Guo Yining Sun Xinran Qu Qiyuan Zhang Jiashu Guo Ziming Wang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6, China

## Abstract

Ecological migration is caused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r the migration activities to improve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social stability in ecological immigrant areas,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residents affect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then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whether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area can be improved, whether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s improved, and whether the quality of life can be improved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The paper uses five villages and one urban community in Hongsibao District, Ningxia, China, as the survey area, deeply explores the causes of local cultural qualit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ment tren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quality and employment trend through independence test,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based on Premark principle and Bandura observation and learning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era backgroun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area.

## Keywords

Hongsibao; cultural quality; employment tendency; independence test

## 中国宁夏红寺堡区生态移民文化素质及就业趋向调查

郭嘉禹 孙艺宁 屈昕然 张起源 郭佳澍 王梓名

吉林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116

## 摘要

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人口迁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生态移民区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 而居民的文化素质影响就业状况, 进而影响生活质量。因此, 生态移民区居民的文化素质能否提高, 就业状况是否改善, 生活质量能否提升, 决定生态移民的成败。论文以中国宁夏红寺堡区的5个村和1个城镇社区为调查区域, 通过深度访谈法深入探究当地的文化素质成因、就业趋向的影响因素, 通过独立性检验探究文化素质与就业趋向之间的关系, 并结合“互联网+”时代背景, 从文化素质的角度, 提出了基于普雷马克原理和班杜拉观察学习理论的几点建议, 以期促进生态移民区的和谐稳定。

## 关键词

红寺堡; 文化素质; 就业趋向; 独立性检验

## 1 调研基本情况

### 1.1 调研概况、目的及意义

#### 1.1.1 调研背景

生态移民亦称环境移民, 是指在生态系统中, 多种原因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枯竭, 导致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激化, 人类为了生存而主动调整其自身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保持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对平衡所进行的人口迁移<sup>[1]</sup>。

红寺堡移民开发区是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开发区,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 属半干旱荒漠草原, 干旱少雨。1998年, 红寺堡移民开发区开始接纳来自宁夏南部山区的搬迁农户<sup>[2]</sup>。

#### 1.1.2 调研目的

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所掌握的相关技能与其就业趋向及收入情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对文化素质和就业趋向的调查不能将二者割裂开, 而应深入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 我们的调研目的为: 从考察生态移民文化素质及工作技能的角度出发, 对红寺堡区进行实地调查, 进而分析生态移民的就业趋势, 探求文化素质与就业趋向之间的相关关系。

#### 1.1.3 调研意义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考虑, 生态移民可以避免居民对原居

住地脆弱的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使原居住地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和重建。但在当地农户的层面上,追求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才是原始动力。如果搬迁不能改善其生活水平,那么,已搬迁者可能会回迁,未搬迁者也不会选择迁移<sup>[2]</sup>。因此,在生态移民过程之后,提升移民的文化素质,改变其就业趋向,最终提升其生活水平,是生态移民成功的关键所在。

探究文化素质与就业趋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文化素质角度发现红寺堡区生态移民的就业现状及就业趋向的成因,进而找到提升当地生态移民文化素质、改变就业趋向的方法,从该角度提高生态移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生态移民区的和谐稳定。

### 1.1.4 调研过程

我们采用深度访谈法,以红寺堡区的中圈塘村、永新村、朝阳村、团结村、弘德村、红寺堡镇政府、东方社区为调研对象,获取样本 103 份,经删选最终获取有效样本 79 份。调查对象包括农户、个体工商户、企业老板、公益服务人员、村干部、镇政府工作人员等。

### 1.2 调研思路

首先,统计出各个村落村民的学历情况、就业趋向、工资以及各职位学历要求、入职培训情况、政府的政策支持等相关数据,进而证明生态移民的文化素质、工作技能和就业趋向与收入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其次,在了解居民当前的文化素质后,深入剖析其文化素质位于现有水平的多方面成因;接下来,在了解村落有哪些就业方向之后询问受访者未来的就业想法,结合现有客观条件和政府政策综合分析出其就业趋向的影响因素;最后,统计分析访谈数据,发现削弱文化素质对就业趋向的影响程度的一些因素。调研框架如下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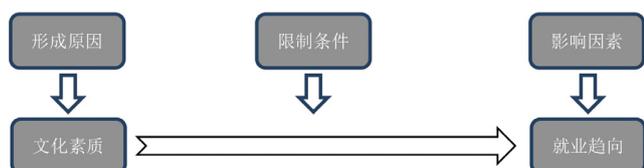


图 1 调研框架

## 2 调研数据统计与分析

### 2.1 不同年龄段居民学历分布状况

由于当地大部分 20 ~ 30 岁居民还在外地就读,对此年龄段采样样本很少。同时部分 50 岁及以上居民学历受当时制

度影响很大,不能代表其文化素质总体趋势。因此经过后期筛选整合,我们集中分析了 30 ~ 50 岁居民的学历分布状况,共 42 份有效样本,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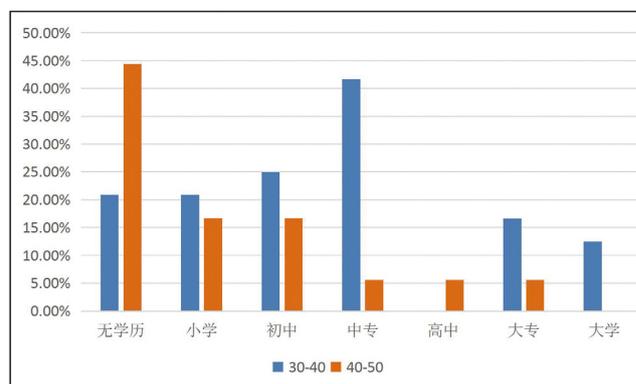


图 2 各年龄段学历分布图

分析图 2 可知,受访的 18 位 40 岁以上的居民中,有 83.35% 的样本学历集中在九年义务教育以下,24 位 30 ~ 40 岁的居民中有 50.87% 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且读完大专或大学的居民比例有所上升,分别占有 19.04% 与 14.28%。对本样本进行独立性检验,证明了学历与年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独立性检验涉及的数据如表 1 所示,  $K^2$  观测值  $k=7.412$ ,查表得有 99% 的把握证明年龄层与学历相关。这说明了生态移民前后居民文化素质大幅提高。

表 1 样本频数列联表

年龄 \ 学历	学历	
	初中以下	初中以上
30-40 岁	10	14
40-50 岁	15	3

### 2.2 居民改变就业现状意愿分析

由图 3、4 可知,城镇居民的改变意愿显著强于农村人口。经独立性检验,  $K^2$  观测值  $k=2.081$ ,因此有 85% 的把握证明居住地为影响改变就业现状意愿因素之一。

据访谈实录和所查阅文献知,生活满意度也是影响改变就业现状意愿的一大因素。经独立性检验,  $K^2$  观测值  $k=7.025$ ,因此有 99% 的把握证明生活满意度为影响改变就业现状意愿因素之一。综上所述,居住地与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为影响改变就业现状意愿的两个重要因素。

由图 5、6 可知,城镇人口中多数对生活现状不满意者有改变就业现状意愿,而农村人口中多数对生活现状不满意者无改变就业现状意愿。说明在对生活现状不满意的情况下,

许多农村居民并没有寻求更好的就业方式，即农村居民改变就业现状意愿弱。经独立性检验， $K^2$  观测值  $k=8.394$ ，因此有 99.5% 的把握证明居住地为生活现状不满意人群改变就业现状意愿的影响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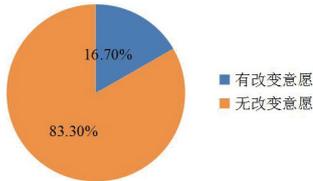


图3 农村居民改变就业现状意愿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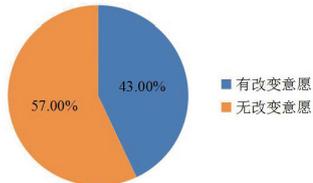


图4 城镇居民改变就业现状意愿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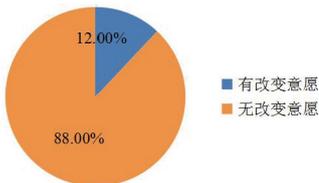


图5 农村居民不满意生活现状人群改变就业现状意愿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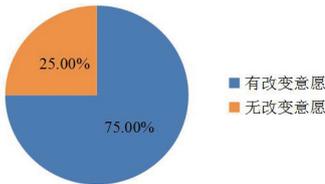


图6 城镇居民不满意生活现状人群改变就业现状意愿分布

### 2.3 文化素质和就业趋向之间的关系

由图7可知，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样本共42份，多数停留在不稳定和低层次的就业状态，就业质量较低，职业选择空间较少。当学历上升到中专和高中时，共获得样本10份，其就业范围得到扩展，但是分布仍然较分散。大专和大学学历的样本共24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更高，他们的就业状况明显优于前两类样本。

综上所述，文化素质和就业趋向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图7 学历 - 职业分布饼状图

## 3 文化素质对就业趋向影响分析

### 3.1 居民文化素质的影响因素

#### 3.1.1 生态移民原居住地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40岁及以上居民文化素质较低客观上是生态移民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原产地（如彭阳、海原等地）缺乏教育资源，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子女读书。主观上与当时人们教育观念落后有关，个别地区思想封建，父母不支持女孩读书。

#### 3.1.2 生态移民现居住地影响因素

前文已经证明当地居民的年龄层与学历相关，这是因为政府针对生态移民出台了大量教育政策，增加教育资金的投入，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都积极鼓励居民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这使生态移民之后居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情况显著提高。

但是通过对30~40岁的居民及其子女调查发现客观上经济状况仍然是影响当地居民文化素质的因素。如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无法承担学生复读的学费；部分该年龄层的农户家庭拥有两个及以上的子女，导致一些经济困难的家庭无法兼顾所有子女坚持读完高中或备考大学。不过得益于当地政府的“雨露计划”“四点半课堂”和免费的定期培训等政策，这些因素对居民文化素质的影响程度开始削弱。同时，家庭与环境因素对居民的文化素质影响程度上升。父母与兄弟姐妹的受教育水平与工作职业对居民主观上接受教育的意愿有着很大影响。在受访者中，对于学历相对较高的父母，他们的子女对接受教育的主观意愿更高，从而学历更高。如果父母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周围的同龄人受教育程度低，受周围大环境的影响，这些孩子也可能提前辍学。

#### 3.1.3 民族因素

研究发现不同民族对教育的主观认识程度不同。朝阳村是一个汉民与回民各自集中的村落，汉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较强，而回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较弱。在调研不同民族对教育认识程度出现差异的过程中发现，当地部分回民不经常与外界交流，他们在农闲时期，也只是在家里照看孩子，一般不会与邻里交流。通过对部分回民商户（小吃店、服装店及彩妆店老板）进行访谈发现他们平常的客户大部分是汉民，因此与汉民的交流比较多。同时，他们对子女的教育相对重视。对比该村落汉民与回民访谈对象，在排除父辈教育程度与原产地教育资源的差异后，研究发现当地部分回民对教育的主观认同相对较差是由于他们对外界信息的接触

较少,闭塞的信息渠道导致教育观念落后,从而影响了子女的文化素质。

### 3.2 居民不愿改变就业现状的原因

#### 3.2.1 居民认为自己无相关知识技能且无机会获取相关技能

通过分析访谈结果发现,自身文化程度低的问题被提及频率很高,部分受访者认为此问题使他们没有能力改善生活。学历低和获取信息能力弱大大削弱了他们改变生活现状意愿。而在调研政府开展培训和下派专家的情况时,发现年龄较大的受访者参加培训次数很少的问题。这表明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中存在不积极关注政府组织的培训活动等新形式扶贫活动的问题。他们获取技能和信息能力本就相对较差,且不积极改善,即使政府已提供机会,仍有部分农村居民存在难以提升工作技能的问题。

#### 3.2.2 农村居民中普遍存在得过且过的想法

在有限的调查样本中,所有对生活现状不满意但无意愿改变的农村居民样本都提到对待现在生活中的问题不处理、走一步看一步的类似态度。许多农村居民提出,即使未来的经济问题有很大可能无法合理解决,也不想改变现状。在整理相关文献和调研实录的过程中,提取村民回答的关键词,发现这种现象和对未来生活质量的追求有关,他们对未来并不抱有太多向往和期待,认为生活状况和社会政策变数较大,改变就业现状的风险超出承受能力。

### 3.3 居民有改变就业现状意愿但不能付诸实践的原因

#### 3.3.1 受教育水平较低居民不了解相关政策

多数居民不会直接参与政策的下达过程,且政策中有部分专业描述和表达,这使许多居民了解政策有困难,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以贷款政策为例,调查数据显示,受教育水平初中以下的居民有近20%明确提出不了解贷款政策。在不了解或了解不足的情况下,民众易对政策出现误解。比如对于贷款政策,有居民认为贷款以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依据来确定可办理贷款额度,或政策中可能存在许多类似霸王条款的不确定因素。这种误解削弱了居民对政府贷款政策的信心。对贷款政策的不熟悉直接导致居民在改善个人生活的过程中本可以合理解决的资金问题无法解决。

#### 3.3.2 残障人士就业困难问题

在红寺堡区我们调查到的残障人士均没有工作,而他们均表示有改变现状意愿,希望就业。其中有一典型案例,是

一位独臂的受访者。他提到自己尝试寻找工作,但由于存在歧视现象,且其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没有单位(包括一些原则上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愿意接收他。调查数据显示,残障人士的相关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仍有较大的欠缺,这使残障人士主动改善生活的意愿难以实现。

### 3.4 文化素质对就业趋向的影响

#### 3.4.1 提升文化素质有助于改善就业状况

我们通过两个典型案例证明此结论。第一个案例:当地政府在弘德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园区为闲置妇女提供了刺绣技能的免费培训,极大提高了剩余劳动力的利用,至今培训规模已达九千余人。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后,能自由支配时间的妇女可以选择去从事全职或兼职的刺绣工作。她们的就业趋向由此得到好转。第二个案例:红寺堡镇马镇长说,镇上会不定期地提供挖机、电焊、小吃制作的技能培训,今年培训了200余人。受训者成为技术工人,使原有的职业面得到了扩展,收入情况也变得更加可观。

#### 3.4.2 低学历或技能缺失限制就业

我们通过一个典型案例证明此结论。通过对中圈塘生态餐厅李老板的深度访谈了解到李老板是护理中专学历,毕业后在医院从事相关工作,但几年之后,由于医学相关职业的学历要求提高,李老板由于经济条件欠缺没有接受再教育,所以被迫转行,这就是技能缺失的就业限制。

### 3.5 文化素质对就业趋势影响的干扰因素

#### 3.5.1 过渡期经济不稳定状况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两位有独立且具体的改变现状想法的居民。其中一位受访者是开大客车司机,这位受访者有开客车的想法。但是担心职业变动期间家庭经济问题无法解决,不敢变动工作。另一位受访者已找好工作,有详细的职业规划,打算用两年时间积累经验人脉再开自己的店铺,但是由于其孩子们年龄较小需要照顾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

#### 3.5.2 妇女家庭负担较重状况

近半数受访妇女需要照顾3-4人,最多的需要照顾6人。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照顾还是农业上的劳作,都使妇女过度劳累导致没有时间进行其他的安排。有部分女性受访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且有改变现状的意愿,但由于家庭负担重,选择放弃就业。

#### 3.5.3 政府产业扶持不持续状况

以中国政府在中圈塘村扶持的农家乐产业发展为例:政

府原计划通过安排航模基地游客和中国共产党党校学员入住来带动农家乐产业发展,但由于有关航模赛事减少等原因,农家乐产业收入减少。虽然现在政府仍在积极分配游客入住农家乐,但农家乐产业亏损状况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 3.5.4 文化素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状况

在一处由中国宁夏的彭阳移民来的村落里,有一些居民家中从事养蜂行业。由访谈得知,在中国彭阳生活期间许多人家都从事养蜂行业,因为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选择继续养蜂补贴家用。但受访者现在的居住环境在客观上并不适合养蜂,由于受访者短期内没有寻找到其他经济来源,只能维持现状。据了解,村委会并没有对当地居民的养蜂技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几家养蜂户都是以个体形式经营养蜂事业,独自承担交通成本和风险,而且需要自己联系蜂蜜收购方。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综合导致当地居民的养蜂技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 3.5.5 部分居民对当地客观条件认识不足状况

部分居民对当地消费水平、市场容量等客观条件认识不足,导致盲目投入过多且经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例如中国永新村民宿产业连年亏损。中国政府对民宿投资了厨卫设施和门窗,农户对民宿内部的家具生活用品等也进行了大量投资,走访的民宿可居住人数均在10人以上。有一位农户在访谈过程中提到,以今年上半年的收益预估未来的收益,则十年都无法收回成本。

## 4 促进生态移民充分就业的对策

### 4.1 通过学习让居民充分了解并相信政府就业政策和培训举措

#### 4.1.1 建立积分制,使用强化物培养居民的学习习惯

运用行为心理学中的普雷马克原理,即用高频行为(喜欢的行为)作为低频行为(不喜欢的行为)的有效强化物来增加低频行为的发生频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高频行为是得到扶贫福利及资源,低频行为是学习政府的政策和参加培训。

具体而言,村委会或居委会已经做到了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定时举办学习会议,对政府近期的就业相关政策进行讲解,整体上效果显著。不过仍有个别居民学习意愿较低,不愿意主动参加学习会议。为尽量减少这部分居民配合度较低的情况,可建立积分制,即分发给每户居民一张积分卡,

将积分与村委会或居委会的一些福利政策相联系。学习会议要求每户居民至少有一人前来参加,并对前来参加的居民进行信息登记并给予积分奖励。积分将影响其福利领取。

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应注意在前期进行连续强化,即每次参与培训均可获得积分奖励。连续强化是塑造新行为的最佳策略。但连续强化存在两点不足,一是一致性一旦被破坏,学习积极性会大幅度消退;二是连续获得多次奖励后,强化物的强化效果会减小。

因此,在培训的后期应采用间歇强化,因为其为维持已习得行为的最有效方法<sup>[3]</sup>。在培训中后期,居民便会意识了解到政府政策和参与政府培训的益处不局限于获得积分,更可以提高其文化素质,改变其就业趋向。至此,强化物便可以完全取消。

#### 4.1.2 使用观察学习方法,将学习融入生活中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红寺堡镇东方社区的象棋盘等公共设施上印刷着促进民族融合与团结的标语,中圈塘村的墙壁上绘有中国知名大学的油画。这种方法符合观察学习理论。

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学习不仅仅发生在直接作用的操作条件反射中,还可以通过观察、听别人讲述等方式间接学习,而且社会行为的学习更多是依靠观察学习完成的<sup>[4]</sup>。观察学习理论已被相关组织应用于全球社会问题,如通过制作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电视剧来清扫陋习、宣传女性权利等。这些电视剧成果显著,比如印度某农村在宣传女性权利的一部电视剧播放完毕后女孩入学比例增加了10%~38%<sup>[5]</sup>。

前文提到的印有标语的象棋盘和大学油画符合观察学习理论,这种方法可以进一步扩大使用范围,并丰富宣传多样性,比如可以在宣传板和墙壁上绘制具有教育意义的连环画,在当地电视台以及电台播放扶贫成功者的故事等。

### 4.2 借助“互联网+”与社会力量,促进残障人士充分就业

#### 4.2.1 使用“互联网+”残障人士居家就业模式

当地互联网已基本普及,但与就业模式结合不够充分,因此可利用“互联网+”思维,结合当地的枸杞、黄花菜、葡萄酒等产业,通过发挥中国政府主导、引入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具体主体包括电商平台、企事业单位、个人及家庭、残联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大学生等,发展“互联网+”残障

人士居家就业模式。残障人士可利用网络从事网络客服类、网店运营类、设计类及推广类等领域的工作。实施该项措施,分为残障人士工作资源获取及技能培训两个方面,同时需充分落实各个主体责任。

首先,在前期残障人士工作资源获取方面,政府可借鉴采用“服务平台+招聘会/示范基地模式”。服务平台可分为线上、线下两部分。线上部分可在政府官网专门开辟残障人士服务信息板块,为残障人士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政府相关政策的解读服务,使残障人士及时获取政府就业相关信息及优惠政策。同时,政府可采用精准化服务,针对残障人士的不同需求建立残障人士基本信息数据库,根据不同残疾类型、不同残疾程度、不同文化程度及专业技能的残障人士举办不同的招聘会、对接不同就业岗位,以满足其个性化需求。

在线下中国政府可通过建立示范基地、发挥典型个案的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残障人士网络就业创业。如湖南省残联规定,依托电商产业创业、年度销售额10万元以上的残障人士可申报评定为残障人士阳光致富示范户,一次性给予5000元电商创业扶持;稳定帮扶10户以上残障人士家庭产品上线、年销售额50万元以上的残障人士电商创业者可申报评定为农村残疾阳光致富带头人,一次性给予10000元电商创业扶持<sup>[5]</sup>。借助该种模式,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调动残障人士利用电商进行就业创业的积极性,还可采用奖励的形式鼓励各企业为残障人士提供一定数量的电商工作岗位,使残障人士获得工作资源。

最后,在残障人士技能培训方面,政府可借鉴采用“技能培训+政策扶持”模式。政府首先为有意愿的残障人士提供技能培训,具体包括网店的经营方法、电脑的基本操作等。针对不同的残障人士群体,政府可提供不同时长、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培训,如上门或远程培训,使培训更具多样化与针对性。对于接受培训后的残障人士,政府可借用柯克帕特里克评估模型,通过对残障人士进行访谈、技能考核、资格认证等方式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数据库,以不断总结提高培训质量。对于通过技能培训已具备了一定网络创业就业能力的残障人士,政府可提供一定的政策扶持,如提供部分电脑购买资金等,使残障人士有能力、有条件实现居家就业模式<sup>[5]</sup>。

#### 4.2.2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

部分残障人士有就业意愿,同时心理有障碍,消极思维比较严重,不愿进行新型就业方式尝试,对此政府可采用“残联组织+社会工作者”模式。

残联组织具有充足的资源和基础,因此可根据往年残障人士的就业信息情况建立数据库,进行对比评估以发现问题,同时可鼓励残障人士自己前往残联登记寻求帮助,在数据完备的基础上,残联可与社会工作者进行工作上的对接,使社会工作者详细了解当地情况,科学分析数据,以进行理论基础上的实际工作。

社会工作者根据当地情况,可灵活采用个案、小组及社区等多种专业工作方法。如,在个案工作中,残联工作人员可根据往年数据及实际情况找出需受助程度最高的残障人士,使社会工作者介入为其解决心理问题,克服消极心理,端正心态,增强其自主就业意识。在此过程中残联组织应时刻进行跟踪,接受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反馈,动态了解情况,以便下一步工作的进行。而在小组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可借助残联进行前期的宣传和号召,建立残障人士互助组织,使残障人士相互照顾、相互关怀,并可定期举办就业相关信息交流会,以扩大残障人士就业信息的来源,为其就业建立更加广阔的平台。其中社会工作者应处于引导的角色,残联则处于组织者的角色。在社区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可争取建立社区照顾模式,以社区为单位,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人力及物力资源,使社区内工作人员与残障人士建立长期稳定的帮扶关系,以帮助残障人士重获信心,融入主流社会,进而解决其就业问题。

#### 参考文献

- [1] 包智明. 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6(01):27-31.
- [2] 东梅. 生态移民与农民收入——基于宁夏红寺堡移民开发区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03):48-58.
- [3] 菲利普津巴多. 罗伯特约翰逊. 薇薇安麦卡恩. 津巴多普通心理学[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 [4] 王晓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J]. 江苏教育, 2018(40):38-41.
- [5] 高圆圆. 范绍丰.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重度残疾人居家就业模式的现状及对策[J]. 残疾人研究, 2018(04):72-78.